# 一部鮮活生動的歷史

## ——評徐復觀雜文「憶往事」

李震洲

香港是一個具有特殊政治環境的彈丸之地，一方面它代表了中華民族近百年來的屈辱和受迫害，另一方面英國以領主的姿態對香港行使權力，再加上政治現實中它和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廣東省相接壤，水源、食糧、難民潮等，幾乎都影響到香港的生機，於是乎香港就在「中立」、「自由港」的政策導引下，活在國際強權的矛盾夾縫中。香港總督政府要顧慮到中共的態度，所以必須對左派力量容忍；親匪的長江、銀都、珠江等戲院，匪的機關刊物及統戰文化工具，如「大公報」、「文滙報」、「七十年代」、「南北極」，觸目可見的大陸國貨公司，都足以說明中共勢力的橫行；但是聚居在港九的四百萬人口中，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炎黃子孫，他們之中的大多數又都經歷過毛共政權的迫害，所以先天上就對中國共產黨充滿了厭惡及反感，他們這股反共力量的顯現澎湃，出諸於自然本能，實力大得驚人。雙十國慶，港九遍佈旗海，即是一例。

以大衆傳播工具而論，「香港時報」、「華僑日報」、「星島日報」等，都是自由、民主、反共的愛國華人自行集資籌設創辦的；身處異域又是海外對敵鬪爭的第一線，沒有莫大的勇氣和義無反顧的犧牲精神，還眞不容易在強敵環伺的環境中生存。前東海大學教授，現任香港中文大學講座徐復觀先生就是這樣一位具有風骨的文化鬪士，自從一九七二年移居香港以後，八年之間他一共在報章雜誌寫了上百萬字的著作，其執筆態度嚴謹立場中正，以中國文化爲根源，

反對極權反對奴役，寓反共理念於人本主義，及知識份子的良知良能，在海外華人社會裏影響力極爲深遠。時報文化出版公司此番投下了龐大的人力、物力，一口氣替徐敎授出版了四部雜文選集，依其性質分門別類，卽㈠論中共，㈡看世局，㈢記所思，㈣憶往事。

「憶往事」這部選集，是徐復觀敎授用傳記式的筆法，所記下的個人感觸和歷史的剖面，其內容可分爲三類，其一是他的半生戎馬宦海生涯；「軍隊與學校」、「抗日往事」、「垃圾箱外」、「娘子關戰役的回憶」等都足以讓我們透過歷史的回顧，對他早年的投軍從政，有更深刻的認識，他不諱言在軍隊中的學經歷，甚至可以說對於軍旅生涯他頗引爲自傲，他說「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可是到底是秀才講理些呢？還是大兵講理些呢？就我的經驗言之，歷史上最不講理的是秀才，最能講理的莫過於大兵」，這種評價印證於代馬輸卒張拓蕪的手記獨白，愈發能說明軍中社會的講倫理、重義氣、薄利害的憨然樸實，比起知識份子組成的學界，能讓我們感受到更多中國文化的軌跡和更多中國血脈的跳動。張拓蕪所描寫的大兵世界，透過許多無名英雄、小人物的連綴，讓我們由小揷曲中窺見大時代的風貌，由歷史的縱斷面看來，那是滄海之一粟，但許多微不足道的橫剖面所形成的聯集，也就是一部生動寫實的歷史；徐復觀先生的回憶往事，則是有體系有段落的上下古今談，由他的赴日留學、返國初任軍官、升任上校參謀，到他的受知遇於先總統　蔣公調侍從室辦公，臨危受命參與改組整頓國民黨，我們可以透過居廟堂之高的徐敎授娓娓道來，而管窺到半部中國現代史。

徐敎授用史家的春秋筆法，忠實的刻劃出他所曾經面臨的巨變和挫敗，並加以他個人的主觀評價，他沉痛的說：「民國三十二年起……我認爲國民黨早變成由傳統知識份子所集結的一個在社會不生根的黨，雖然其中許多是好人，但很難發現眞爲實現三民主義而肯作無私努力的人……於是我幾次向總裁進言，希望把國民黨改造成爲代表自耕農及工人利益的黨，實行土地改革，把集中在地主手上的土地，轉到佃農貧農手裏，建立以勤勞大衆爲主體的民主政黨」。這個大規模使國民黨脫胎換骨的方案，得到領袖的首肯，然而實行起來却遭遇到太多的困難，黨裏面的派系力

量反對，大地主反對，代表資本家利益的財閥反對，再加上抗戰勝利，面對的現實問題更多，黨內改革爲之停頓。但是黨內實施改造和土地改革的原始構想並沒有因此而廢棄，經過三十八年的戡亂剿共戰爭失敗的教訓，國民黨在三十九年終於進行了黨的改造運動，四十年全面實施土地改革、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等政策的施行，都是沿用昔日的方案，這充份的說明了徐教授的高瞻遠矚和洞燭機先。

第二類性質的文章是遊記，因徐教授精通日文，却不懂英文，所以旅行美國、加拿大等地，語言上有些障礙，這段回憶他就自稱是「瞎遊雜記」。在徐教授的旅途之中，他接觸到許多中國人，有的是美籍華人，有的是取得了永久居留權，有的是堅決擁護我政府，也有的傾向中共政權，在這麼多華人或是華裔人士當中，心向我政府的佔了相當大的多數。除了一部份有親戚朋友陷在大陸的華人容易受「回歸」、「認同」統戰政策的影響而外，其餘的皆不容易爲匪所誘；但釣魚台事件却是一個政治上的轉捩點，這個事件中，政府除了發表聲明不承認第三國的私相授受，並宣稱我保有一切釣魚台海域的主權而外，並沒有其它護漁、巡航、插旗的積極果敢行動，其着眼很簡單，就是爲了維護岌岌可危的中日既存外交關係，更不能開罪我們最重要的盟邦美國。相形之下，中共則沒有任何包袱，它和美、日二國皆無正式外交關係，所以它大肆恫嚇、叫戰、抗議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爲，並派出拖網漁船隊到釣魚台海面捕漁，以顯示它的積極爭取主權，於是乎一個以民族主義爲號召、標榜愛國開始的保釣運動，就在「國民黨政府領導方針的失誤」、「中共投羣衆心理所好」的情況下，轉變成爲「反對國民黨，擁護祖國統一大業」的左傾政治運動。這一個事件給我們一個很沉痛的教訓：就是主政者在下達一個決策時，必須將眼光放遠，不必爲了眼前短暫的利益而投鼠忌器，而應該從國家長遠的生機命脈去考量問題。

依據徐先生個人的體驗，他把美加等地華人左派分成「可以講理的左派」，和「不可以講理的左派」。可以講理的左派，「是承認社會主義的大方向，承認中共做了許多有意義的事情，但中共的說法作法並非完全合理的，甚至中共政權結構自身，是含有某種基本性的矛盾與缺點，而需要作根源性的克服」，不

可以講理的左派，則認爲「凡出於中共之口、之手的都是絕對地眞理，都非常地偉大，不允許任何人加以懷疑，懷疑便是反革命」。可以講理的左派是我們在外交上、宣傳上、組織上所該積極爭取的，我們可以擴大中共政權的危機感，並且對中華民國政府建設的成就廣加宣揚，透過對比的形式，讓可以講理的左派深信在海峽二邊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元競賽中，民主憲政制度必能戰勝不談人性、廢除私有財產、標榜馬列主義的共產主義制度。總之，對付海外左傾華人也好，對付臺獨份子也好，對付國際間變化莫測的詭局也好，我們必須牢記　先總統蔣公「不是敵人就是同志」的昭示，縮小打擊面開拓爭取面，使我們的阻力減到最小，絕對不可持着「一小撮臺獨份子不成氣候」，「少數陰謀份子並不足慮」的心態；因爲旅外的華人，不論入了美國籍，或是有了居留權，他們在外國社會中大多數都是中產階級以上，有了相當的身份地位。透過各種公開聽證會的作證；在外國報刊雜誌上投書，刋登廣告；利用遊說團體或政治壓力團體，對國會議員及行政部門展開反覆包圍攻勢；甚至在街頭舉行反中華民國政府的示威，都會對我政府造成不利影響，再加上若干左傾親共新聞媒體的大肆渲染，益發使得我們國家的形象扭曲。爲了改變這種情勢，我們必須謹記「製造一個敵人簡單，爭取一個朋友不易」的道理，用更寬容、更博大的胸襟來拓展我們的多邊對外關係。

徐教授提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爲什麼在臺灣因講民主自由而和國民黨弄得很不愉快的人，來到美國後即使左，也只左到講理左派的程度，反而在臺灣時是忠貞之士來美後，若是左了，便左成不講理的左派呢？」但是他沒有提出明確的答案。依我個人的看法這些在臺灣因爲爭美式自由求西方民主的知識份子，在成爲問題人物憤而赴美以後，之所以不會變成激烈不講理的左派，主因是他們天性就不容易絕對認同於現狀，對於任何政治體制他們都抱着批判的態度，他們是毛病的尋求者，現狀的改革者，他們在臺灣讓政府當局頭痛，轉向以後同樣讓中共頭痛，臺灣當局把他們視爲分化內部團結的敵人，同樣的在中共心目中他們也不是推心置腹的朋友，因此講理的左派往往走上了「既非楊又非墨」的中間路線。至於在臺灣是忠貞之士，赴美後一旦左轉，則往往成爲不講理的

左派，其理由大概是原來對政府抱着太過完美的求全之望，一旦去了外國，接觸到的儘是些偏袒中共貶抑我們的訊息，再加上四人幫事件之後，中共用更低姿、更理性的統戰方式，給人一種溫和穩健的錯誤印象，因此覺得過去受了欺騙，立刻認同於中共的「民族大義」。要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就必須讓我們的大衆傳播工具充份的發揮功能，不避諱自己的缺點，對於匪情現勢的評估更要客觀坦然，切忌沿用「匪區動亂敗亡可待」的宣傳教條，這樣才能讓出了國的青年朋友們心中有準備，不致於遽然接觸完全相反的資料而無法適應。

對於曾經轟動一時的鄉土文學大論戰，徐先生抱着贊成的態度，因爲「鄉土文學要使文學在自己土生土長、血肉相連的鄉土生根，由此以充實民族文學、國民文學的內容，不准自己的靈魂被人出賣」、「鄉土文學必然也會反映這些生活不斷下降的父兄子弟的寫實文學，他們把有時可望見顯要豪富們的顏色，幻成水中月、鏡中花的文學，斥之爲買辦文學、洋奴文學」，「這種話一經說穿，文學的市場可能發生變化，已成名或已掛名的作家們，心理上可能發生門前冷落車馬稀的恐懼」。這席擲地有聲的談話，一語道破欲用政治力量來干預文學領域者的居心，別人鼓吹提倡鄉土，自己是「閩秀派」、「劍俠派」，是「戰鬪文藝派」、「星空希臘派」，鄉土不起來，醋勁大發之餘爲了保有自己的文藝市場，於是乎成了民族的鬪士，國家之干城，假「愛國」、「救亡」、「反共」之名，亂丟紅帽子，「與匪隔海唱和」啦，「匪的第五縱隊」啦，「普羅文學的臺灣總代理」啦，每一頂帽子都是又重又大，足以置對方於死地。

徐先生語重心長的說「這種帽子不是普通的帽子，可能是武俠片中的血滴子，血滴子一拋到頭上，就會人頭落地」。說到這裏不由得使人感慨萬千，三十年前政府剛撤退來臺，一百萬以上的外省同胞、軍人、公務員跟着流離輾轉，當時確有不少匪所派遣的滲透份子混雜其間，隨着臺灣的安定繁榮，保防工作的劍及履及，不論是匪所臥底的也好，或是原臺共的殘餘份子也好，幾乎在人神共棄的民族情感下被清除殆盡；我們實在想不透從小學到研究所都接受三民主義教育的培養薰陶，既未出過國門，也不曾閱過匪僞書刊報紙的青年一代，怎麼會和匪的同路人扯上關係的

？滿天亂飛的血滴子，和這一些青年朋友的腦袋、型號是不是完全符合也還有待我們的研究？徐先生惜才之餘，對於主張鄉土的青年們也有一番忠告——「不可輕用共黨的特定名詞，以致容易引起誤解」，「更不可因受到無理的刺激，便對共黨輕存幻想」，一片長者愛護後進的風範，眞令人感佩不已。

第三類的文章，也就是本書的精華所在——對人物的感懷憶舊。這些個篇章全部是在當事人逝世以後所做的追思悼念，有一股蓋棺論定的味道，更可視爲恰如其份的墓誌銘。一代偉人胡適之先生過去了，徐教授以「一個偉大書生的悲劇」爲題，表達了他的哀悼，其時臺北的「文星雜誌」、「民主評論」正爲了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功過貢獻，和他一篇貶抑中國文化的演講而發生筆戰，無疑的徐教授是屬於反胡的人物之一；但是一旦胡適死了，他立刻停止爭論，拋開「反胡」或是「擁胡」的立場，而站在一個中國的知識份子的立場超脫出過度溢美之詞的輿論，深切的觸及胡適內心的落寞。他對胡適有批評，也有肯定，他說「我對胡先生的學問，雖有微辭，對胡先生的文化態度，雖有責難，但一貫尊重他對民主自由的追求，也不懷疑他對自由民主的追求，他在民主自由之前從來沒有變過節」，他認爲胡適回到臺灣以後，表面是熱鬧，但是內心的寂寞，正和每一個有良心血性的書生完全一樣，「胡適之所以是一個悲劇性的偉大書生，原因就在於此」。徐教授評胡適最膾炙人口的，至今仍被許多人所沿用，那就是「胡先生在五四運動時代，有兵有將，卽有青年有朋友，民國十四、五年以後，却有將無兵，卽是有朋友而無青年，今日在臺灣既無兵又無將，卽是既無青年又無眞正的朋友」，正因爲如此，便更削弱了他對現實發言的力量，更增加他內心的苦悶乃至痛苦。胡適的喪禮上，我們聽到的、看到的，全都是無懈可擊的頌揚之辭，但是我們不禁要問：在諸多以「我的朋友胡適之」相標榜的人當中，到底有幾個是眞正了解這位「中國文藝復興之父」的？

殷海光先生一生的經歷，可說是極其坎坷而又富有傳奇性的，以自由主義者自居的殷先生，一生追求的是自由、眞理、友愛、正義，他不能見容於極權、專制、獨裁和恐怖統治，所以他跟隨着政府來到了臺灣，他不講情面、大公無私、得罪人、不流俗，使得

他的名譽又臭又硬。罵他的人說他狂妄、驕傲、夜郎自大，贊同他的人說他是五四後期人物、自由主義的象徵、不折不扣的知識份子，究竟他是怎樣的人呢？曾經做過他的朋友，後來變成他的敵人的徐復觀教授在殷海光先生因胃癌不治以後，以一篇「痛悼吾敵、痛悼吾友」來表達他對殷先生的懷念。殷海光先生的性格和思想，是以現代科學的鉅力爲背景，他舉着科學的大旗（主要的內容是邏輯實證論），趨向偏急之路，要摧毀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切，這也是他能在青年層中得到聲譽的原因。但是殷海光先生却有勇氣接受新的觀念，釀出新的動向，他並能公開承認過去文章中的許多錯誤，在陳鼓應編著的「春蠶吐絲」一書裏，我們可以看到不少此種深切的反省和思想的蛻變，從這個角度看，殷先生在學術文化上的轉變，對一個人的自我形成，及學術風氣的突破，實在含有重大的意義。徐教授持平的說「我們從一個人的歷程中觀取他的大方向，以某人歷程中的某一弱點來概括某人的一生，我認爲是不大公平的」，因爲殷先生中期思想的激越，因而對他戴上有色眼鏡，做出負面的評價，這是不忠實也是不合理的。

徐教授站在亦敵亦友的立場，還殷先生本來的面目，他說「中國二千多年知識份子一直在法家所提倡的賞罰二柄的驅策下，絕對多數漸漸變成了軟體動物……不僅不容易發現一個在人格上能自知愛重的人，也不容易發現一個在學問上眞能尊重知識追求知識的人…他的硬骨頭、眞熱情所發出的精光，照耀在許多軟體動物之上，曾逼得他們聲息毫無，原形畢露」，這種做人的品格，追求眞理的熱誠，實在值得吾人景仰效法。

其餘諸篇悼文，寫的是溥心畬、雷震、方東美、沈剛伯、魯迅，魯實先、蕭一山、熊十力等諸位先生，各具其功力，也各有價值。在徐教授敍舊憶往的過程中，我們彷彿看見了諸位先生鮮活生動的形象，尤其難得的是對這些人物的品評能守正不阿質樸眞實，決沒有因感情而來的誇大。總之，徐教授的「憶往事」，是感性知性並重的，他對人物事件的刻劃描寫，主要的素材是他親身的體驗接觸，但却又能理性冷靜地置身事外，爲人的歷史地位作證，爲事的是非曲直裁判，讀他的「憶往事」，在鮮活生動之餘，又讓我們產生更深一層的聯想，我願意向讀者鄭重的推薦。